

余华小说中“平静的叙述者”研究

陈蕾

天津大学

DOI:10.32629/mef.v8i20.17974

[摘要] 文章研究余华小说中的“平静叙述者”，国内外研究虽多，但缺乏系统性。余华的这一风格贯穿其创作始终，并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文章从三方面展开分析：余华小说中平静叙述者的书写主题；其作品呈现平静叙述的成因；平静叙述者的美学特点。文章认为，余华小说用平静叙述将暴力、血腥显露出荒诞本质，又用诗化语言将暴力变得宁静，进而通过平静叙述深拓了文学中生存的哲学思辨意涵。

[关键词] 余华；小说；客观叙述；温情叙事

中图分类号：I287.4 **文献标识码：**A

A Study of the 'Calm Narrator' in Yu Hua's Novels

Lei Chen

Tianj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calm narrator" in Yu Hua's novels.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research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systematic studies are lacking. Yu Hua's narrative style runs throughout his works and exhibi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period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opic from three aspects: the writing themes of the calm narrator in Yu Hua's novels; the reasons for the presence of calm narration in his works; and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lm narrator.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Yu Hua's novels use calm narration to reveal the absurd nature of violence and bloodshed, while poetic language renders violence tranquil, thus deepening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existence in literature through calm narration.

[Key words] Yu Hua; novels; objective narration; tender storytelling

前言

本文试图针对余华作品里平静的叙述者展开比较深入文本分析，剖析其运用这种平静客观而独特的叙事手法怎样呈现人物心理深度与社会现实，以及该叙述方式对作品文学价值和审美效果产生何种影响，进而追寻余华小说中平静叙述者技巧的文学史意义、美学价值以及社会意义，全面理解余华借助其作品怎样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深刻思考与平静表达，以及这些作品如何反映并影响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文化。

1 余华小说中平静叙述者的书写主题

平静叙述者是余华小说中的基本主题，但前后期有不同表现。

1.1 前期主要写人性之恶

在先锋文学作家群体中，余华前期作品受到川端康成忧郁式美学影响，大量运用死亡暴力、血腥怪异的文学内容表达对现实世界本质的认识。余华前期把血腥暴力当作表达自我的工具，将内心世界的纠结痛苦外露为最暴力的现实。余华先锋小说里的叙述者总是带着冷淡的旁观态度，对于血腥残酷的情节，始终

平静沉着地旁观，用不带感情的冷漠语言将现实完整呈现，只有事实，没有情感。这种叙述充满了中立、公允和淡漠的味道，就像一台摄像机对客观现实进行冷静记录。

在《现实一种》中，幼儿皮皮因玩耍失手摔死堂弟，叔叔山峰为报复将皮皮摔死，哥哥山岗又设计杀死山峰，最终山岗被处决，尸体被医生解剖研究。其中皮皮摔死堂弟的场景非常典型：“而后他看到有几只蚂蚁从四周快速爬了过来，爬到血上就不再动弹。只有一只蚂蚁绕过血而爬到了他的头发上，沿着几根被血凝固的头发一直爬进了堂弟的脑袋，从那往外流血的地方爬了进去”。^[1]这个本应充斥着不安、愧疚、恐惧的场景在余华笔下却不见一点情感，刻意回避多种情感，迫使读者直面死亡场景。

文中对兄弟间的相互摧残视作现实苦闷的平常表达，余华站在旁观者一边，用零度的眼神看、用零度的语言说、用零度的感情写。将暴力描写得直观且毫无美化、无可回避。这种不加修饰的白描式暴力叙事，让家族内部的仇恨循环以触目惊心方式呈现，颠覆了传统文学中对家庭温情的想象。

然而这种形式上的暴力书写一次次叠加，越叠加就越让余华内心感到空洞。他笔下的人物只是刻板的暴力执行者或被执行者，这样的先锋作品太注重形式变革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模仿，缺乏本土文化滋养。所以余华开始了第二次创作改革，虽然依旧用客观语言描写生存苦难、底层卑微，但他的笔尖深入了更踏实的生活之中，将天马行空的叙述落地生根。“从‘十八岁到第七天’，余华从‘自我’发现的话语先锋，到‘款待’他人的聆听生存，再到‘见证’时代的介入现实，这是一个趋于广阔的意识与创作的历程。”^[2]

1. 2后期主要写生存的苦难

“在余华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中，‘苦难’的主题被延续了下来，但这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出现了新的艺术风貌，在内容上体现出新的内涵，在形式中赋予了新的意义。具体来说，在余华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中，‘苦难’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人生悲剧和生存困境，偏执的暴力转化为生存的苦难，冷酷转化为温情，无情转化为悲悯，人性的罪恶转化为后期的包容。”^[3]

余华的转变逐渐显现，他不再简单地用“摔死孩子”“解剖尸体”这样的极端场景给读者制造心灵震撼和冲击，而是让暴力在日常的忽视与冷漠中静静发酵。孙广才在妻子病榻前的敷衍冷漠，孙光林在文革中被集体抛弃的独身孤独，这些更贴近中国乡村伦理的隐痛，比鲜血更刺骨。小说里对“细雨”意象的反复书写——潮湿、黏腻、渗透一切，恰是余华对本土经验的一次温柔触摸：他开始懂得，中国社会的苦难从来不是暴烈的断裂，而是像细雨般无声浸润着每一代人的命运。

福贵牵着老牛行走在田埂上的那个背影，许三观撸起袖子时所露出的卖血疤痕，这些带着温度的有关血的细节，替代了抽象的暴力展演。“因为在祸福相依生死有命的宿命论中，唯一执着于当下的‘活着’的力量是不会消失的，它现在确实发生着，即由当下的耕田犁牛的老年福贵承担着。它虽孑然一身却开朗豁达，它带着经历留下的痕迹、深思熟虑后为活着去经营、去行动，它们共同触发了‘活着’的真谛。”^[4]余华依然用客观语言铺陈故事，富贵们“没有像传统悲剧英雄那样慷慨赴死或愤怒抗争，而是选择用最朴素的方式——活着，回应命运的刁难。”^[5]显现了中国农民特有的隐忍与坚韧。作品没有用血浆冲击读者的神经，而是让人物在时代浪潮中起起伏伏，让生存本身变为最为震撼的暴力。这种对苦难的包容，实则是对生命尊严的最高礼赞，当人不再追问“为什么是我”，而是坦然接受“我就是如此活着”，苦难便从生命的枷锁，转化为精神的铠甲。

2 余华作品呈现出平静叙述的成因

余华作品呈现平静叙述有多种原因。

2.1 书写暴力血腥的成因

中国传统文学追求“真善美”，以挖掘人的闪光点或良知为主题，多是才子佳人、侠肝义胆或忠贞报国的故事，体现对朴素良善和高道德感的追求。不仅创作者偏爱书写美的故事，历代统治者也需要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故事在民间兴盛。古代文学经典、四大名著几乎都是“审美”的，少有专门“审丑”的作品。

经过历史巨变，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横空出世。这些作家经历过“文革”，直观接触了人性中被放大的恶、直面了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倾轧摧残。压抑的社会氛围将死亡、血腥、暴力摊开在他们面前，迫切需要发声却找不到合适形式，于是寻求新表达方式。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不断传入，为先锋文学发展提供了土壤。

余华就是其中的作家之一。余华生于医生之家，自小跟着父亲就看惯了生命的无常与血腥的场面。他经常看到父亲从手术室里出来时胸前满是斑斑的血迹，手术手套上也全是鲜血。而后他又成为一名牙医，在工作中每天都与鲜血打交道，因此他比其他文人更早地摆脱了对血腥、暴力、死亡的恐惧。这使得他有能力在小说中客观地描述其他作家略感恐惧的血腥、暴力、死亡，不带有过分的夸张，更有一种冷静的可怕。

余华客观叙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非为了猎奇而书写暴力，而是用“零度”语言客观叙述人性。如《现实一种》中皮眼皮眼中堂弟的死，仅客观记录“他俯下身去察看，发现血是从脑袋里流出来的，流在地上像一朵花似的在慢吞吞开放着。而后他看到有几只蚂蚁从四周快速爬了过来，爬到血上就不再动弹。只有一只蚂蚁绕过血而爬到了他的头发上。沿着几根被血凝固的头发一直爬进了堂弟的脑袋，从那往外流血的地方爬了进去”。^[6]

2.2 书写生存苦难的成因

余华后期写作风格朝着温情悲悯的方向转变，这是由时代、个人经历、文学理念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使的。20世纪90年代过后，中国社会步入转型的深化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先锋文学那种激进的实验活动逐渐退去热潮，文学开始更加重视对现实进行深入地观察与思考。余华也对“审丑”书写的局限性展开反思，他从批判现实转变为理解现实，用温和的笔触去呈现普通人所有的生存韧性。

个人生命体验的不断沉淀使其创作视角发生了变化，早年作为医生和牙医的经历让他习惯用“零度叙事”直面死亡，而到了中年时家庭亲情的体会，让他透过苦难挖掘出其中的温情，对“文革”等历史创伤也从激进批判转变为理解个体在苦难中的无奈。

在文学理念方面，他重新接纳了传统文学美学，后期作品着重以平实的语言去构建苦难中的诗意，叙事伦理从暴露转向悲悯，在苦难叙事中融入了救赎意识。在创作方法论上，他从追求叙事形式的革新转变为注重内容与形式的有机融合，使温情与悲悯的表达更具感染力。

3 平静叙述者的美学特点

3.1 冷抒情的叙述美

平静叙述者体现最明显的是描述暴力场景的客观化。不同于一些作家夸大渲染的手法，余华采取一种冷静客观的叙述方式描述暴力。在《兄弟》中，宋凡平是读者心中的白月光，在那个狂欢混乱的时代，正直、善良、幽默、坚韧的他，注定被排挤、打压。余华没有格外开恩于他，而是清晰地描述了他被红卫兵殴打时，满嘴的鲜血，锋利的木棍像刺刀插入他的腹

部后呼呼流血,让人直观这场催泪的惨剧,显现出强烈的真实的美的张力。

平静叙述者的另一个重要使用场景是体现底层人民生存的苦难。福贵平静地讲述家珍、有庆、凤霞等亲人的死亡时,叙述者并没有把这些事件以悲剧性的抒情修饰,反而通过重复、白描等手法,让生存的荒诞性在语言中自然展现。用白描的手法直接将富贵一生的生离死别展现,没有情感的悲悯,反而让读者在故事真实中体会到悲剧苦难的无可奈何。

3.2 暴力的诗化美

《兄弟》中宋钢的卧轨自杀是一处极具震撼力的悲剧场景。余华对这一死亡过程进行细腻地刻画,把暴力与死亡变成了充满隐喻和诗意的美学符号,体现了暴力的诗化美学。

卧轨自杀本是极端暴力的死亡方式,显示了赴死者对世界的极端绝望,但余华却没有着力于痛感,而用转移视角的方式和诗化语言消解了生理上的痛感。铁轨在文中被描写为一条漫长的道路,在月光里闪闪发亮,用“月光”“闪亮”这类柔和的意象中和了铁轨的冰冷金属感。卧轨自杀的现场本应让人感到不适,但余华在其中掺杂了一些诗化的语言,“驶来的火车让他身下的铁轨抖动起来,他的身体也抖动了,他又想念天空里的色彩了,他抬头看了一眼远方的天空,他觉得真美;他又扭头看了一眼前面红玫瑰似的稻田,他又一次觉得真美,这时候他突然惊喜地看见了只海鸟,海鸟正在鸣叫,扇动着翅膀从远处飞来。火车响声隆隆地从他腰部碾过去了,他临终的眼睛里留下的最后景象,就是一只孤零零的海鸟飞翔在万花齐放里。”^[7]让人感到了宋钢将折磨他的矛盾舍弃了,最终平静地安息了。余华用冷静诗化的叙述淡化了暴力场景的血腥感,用怪异却抒情的笔触将死亡变得具有诗意。

3.3 死亡的哲思美

在亡灵视角的作品中,平静叙述的视角承担着站在第三人称视角观察的重要作用。《第七天》里的杨飞游走于现实与亡灵世界之间,他的叙述语态始终保持着对生死界限的超越性审视。比如他面对自己没有骨灰盒一事十分茫然,好像生死是和其他事一样普通的,“可是我没有骨灰盒,我连落叶归根和流芳千古

这样的便宜货也没有。我开始苦恼,我的骨灰应该去哪里?撒向茫茫大海吗?不可能,这是伟人骨灰的去处,专机运送军舰护航,在家人和下属的哭泣声中飘扬入海。我的骨灰从炉子房倒出来,迎接它们的是扫帚和簸箕,然后是某个垃圾桶。”^[8]

余华用客观陈述语言探索了生命和死亡的意义,将死亡变成一种哲学式的思考和发问。

4 结语

本文聚焦余华小说中的“平静叙述者”即客观叙述手法,它贯穿其创作,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前期以血腥暴力展现人性之恶,后期温情书写生存苦难。与残雪“内向型”暴力不同,余华是“外向型”暴力,直接呈现社会层面的冲击。其主题也从人性之恶转向苦难温情,并通过冷叙述美、暴力诗化美和死亡哲学美学,以克制甚至“冷漠”的笔触,冷静呈现了暴力的荒诞本质与生存哲学。这种手法如裹着薄纱的手术刀,在直面人性深渊与时代创伤时,不美化不掩饰,让人在平静阅读中感受震撼,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审美体验与思考维度。

[参考文献]

- [1]余华.现实一种[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8.
- [2]吴景明.从“形式先锋”“民间生存”到“社会现实”——余华小说创作转向论[J].当代文坛,2019,(4):48-55.
- [3]余华.我的“一点点”[J].北京文学,1985(5).
- [4]俞照曦.举重若轻的沧桑书写[D].漳州:闽南师范大学,2018.
- [5]万晓高.悲剧性美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1:163-164.
- [6]李斌,曲光楠.从接受视角论余华客观叙述的文体特征[J].学术交流,2011,(8):175-177.
- [7]余华.兄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712.
- [8]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7-8.

作者简介:

陈蕾(2003—),女,汉族,内蒙古自治区人,在读研究生,单位:天津大学,研究方向:文艺学。